

聚焦文学新力量

寻找写作的精神地理学

□陈培浩

李晔小说从青春书写出发,从残酷青春而至感伤追忆,逐渐积累了一种嵌入历史的自觉。李晔笔下多为青年人物,不论《朝南朝北》中的朝南、朝北,《步履不停》中的水生,《何人斯》(此篇收入小说集《步履不停》时更名为《去G城》)中的吉他手“他”,《一个人的坏天气》中的罗菁菁,《遇见》中的少年“他”,《看飞机的女人》中的皇甫和卓尔,《米乐的1986》中的米乐和小米……他的小说或书写青年江湖的情仇纠葛,或书写青春懵懂与性爱冲击的纠缠,或于回忆与现实的切换中展示一段高度提纯的爱之怀旧和感伤,或在青年的爱情纠葛中展示命运的无常和人性的叵测。凡此种种,细腻婉转的笔触和令人身临其境的笔力均有其过人之处。

李晔近年的写作力图超越青春,呈现了一种从青春自伤到历史自救的轨迹。青春写作自有其自身的意义,王安忆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作家的处女作代表了他对世界的困惑,而一个作家的代表作则代表了他对世界的稳定看法。作家的处女作常常就是青春写作。青春写作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通过残酷、感伤和困惑的书写跟主流秩序形成某种对峙。青年文化往往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尚未被纳入主流的象征秩序之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青年主体一直处于“父”的压抑之下,从而产生了青春期象征性的弑父冲动以及挑战权威失败的感伤。青春作为一场主流秩序不可克服的病提供了自身的反抗潜能,因而青年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便在于它超功利地在秩序之外提出一种理想生存的可能。不管是哈姆雷特、少年维特还是觉慧,青年主体在未纳入文化象征秩序,未占据父之位置之前,它的理想性、挑战性以及由之伴生的感伤性都是其文学价值所在。不过,青年主体的反抗和创伤一旦在融入象征秩序过程中被疗愈,一旦青年主体占据了旧秩序中“父”之位置并心安理得地维护旧秩序的运作,也就安全地被转化。

对于很多从青春写作入手的作家而言,“后青春”写作的实质是如何在文学想象中融入沸腾的现实、宏阔的历史和有效的象征,如何在内在于时代的同时提供超越性的反思,如何从疏离传统到汇入传统。在谈到李晔小说时,我曾说过:“一批秉持严肃文学立场,企图在被消费主义所殖民的现实中镶嵌进历史视野的青年作家在此背景下浮出水面。在反历史的景观化社会中接访历史,这是他们的历史自救。李晔,正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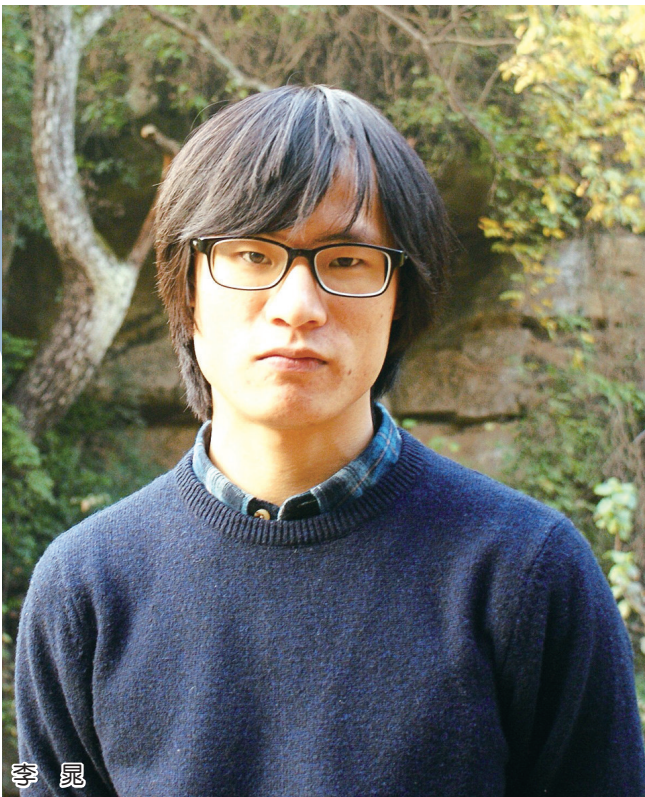
李晔对青春书写的告别,既使他走向与时代的象征性遇合,也催生了他日渐清晰的历史意识。有必要提到《米乐的1986》。1986年既是小说人物米乐和小米的出生年,也是作者李晔的出生年,所以回望1986对于

李晔,是朝向出生年的一种精神寻根。这里包含了一种鲜明的历史意识,一种在历史时间上确认自身来路的写作姿态。小说中,小米基于一种原子式个人主义立场否认时代跟个体之间密切的内在关联,认为“1986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你我出生”。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受教并成长于90年代的小米们习得了一种时代性的个人主义时间意识;米乐对1986年的执著书写则代表了一种与去历史化的个人主义相对抗的历史化立场,代表了一种用“写”来重建个体与历史关联的精神立场。这显然是从青春写作中走出来的李晔投射于米乐身上的。

告别青春书写的李晔越来越自觉地寻找个体嵌入时代的通道,他试图在感性细腻的笔触中发展出对时代的象征性表述。在《看飞机的女人》中,李晔开始将青春的迷惘置于一种更大的时代和精神结构中来表现。小说中,皇甫等一群百无聊赖的青年成天以看飞机为乐,“在铁栅栏外看停机坪里的各色飞机,着迷于起飞与降落,就连那巨大的噪音听起来都觉得如此悦耳,如此激动人心”。皇甫在机场工作朋友的妻子乘着一架A320跟人跑了。婚姻的迅速解体重组堪称一种与全球化同构的机场效应。或许没有任何空间比机场更能代表这个科技推动下高速发展的时代,因此,小说通过典型环境的植入而在故事背后延伸出一层反思现代性意味。“飞机固然代表了人类智慧和科技在挑战地心引力、摆脱地表限制方面的巨大成功,机场的繁忙和飞机出行的日常化同时准确表征了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迅速、扁平和拥挤。“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人类所赖以依存的情感、价值和认同体系也在迅速瓦解,并在人心的饥渴中寻求着新的重建。小说写道:“我只能站在空荡荡的阳台看不远处的机场,那一片灯火璀璨的地方,航站楼的圆形弧顶在夜幕中像一只巨型鸟巢落在大地间,空中的巨鸟们睁着明亮的眼睛正在归巢。”这个精彩的比喻将倦鸟归巢这一传统意象跟飞机/机场的现代情境并置,从而植入了一种科技时代的精神乡愁和文化反思。正是这个象征装置大大拓展了小说的精神纵深。

赋予生存以历史刻度,赋予时代以象征意涵,从而使叙事获得现实指涉和精神纵深,这是青年小说家超越青春书写的必由之路,然而这还不够。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还必须寻找并建构他自身的“精神地理学”。具体到李晔,这个出生于湖南、定居于贵州的青年作家,他有意确认的精神地理其实是“江南”。在《午夜电影》中他对苏童或所谓江南美学的致敬转化为一曲曲径通幽庭院式小说美学。

小说中,青年女教师吴莉莉被分配到一



个偏远的乡镇学校任教,从而缓慢曲折地打开了校长及其夫人张老师之间帷幕重重的命运故事和精神世界。这篇小说不由得唤起读者与苏童《妻妾成群》对照的联想,同样是一个青年女性闯入某个大院式的环境,同样是以女性的主观限制视角来展开叙事,同样以极其细腻的诗化语言打开了通往内心的丰富感受。《午夜电影》毫无疑问与《妻妾成群》在小说美学上构成了家族式相似。吴莉莉无意间闯入校长的秘密影院而目击了偷情秘密,这跟颇莲终于洞悉了陈家后院古井溺杀女眷的秘密有着相似的惊悚。这篇小说属于江南,就因为它属于“庭院”,它以叙事遮挡而创造了种种的情节突转和心理景深。它不是一眼见底、二元对立的三角恋,而是以吴莉莉为玄关创造了校长及其夫人之间的故事深度。及至掩卷,你依然不知道究竟校长和张老师的关系如何维系?张老师如何看待校长的偷情,而校长又如何接受张老师的混血儿子皮埃尔?这些都是谜。正是谜、未知及空白构成了庭院美学的核心。

毫无疑问,《午夜电影》是李晔迄今为止最精致婉转的小说。但它的意义并不止于提供了一篇具有美学意味的作品,更在于李晔有意识将自己汇入一种作为文学资源的“精神地理”之中。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区域地理往是被去根性的。换言之,一个生活在

赋予生存以历史刻度,赋予时代以象征意涵,从而使叙事获得现实指涉和精神纵深,这是青年小说家超越青春书写的必由之路,然而这还不够。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还必须寻找并建构他自身的“精神地理学”。

山东的青年作家跟一个生活在云南的青年作家从入学到走出社会,其基本存在经验可能是趋同的,然而这种趋同正是文学写作的危险所在。全球化背景下时代经验的同质化反过来召唤着作家对“精神地理学”的确认。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不能跟某种区域文化资源接通,并由此获得自身的写作根据地,他的写作终究是很难获得辨识度的。这个问题对于“50后”、“60后”作家几乎不是问题,你很容易从贾平凹、陈忠实的作品读到陕西,从莫言作品读到山东,从苏童、叶兆言的作品读到江南……可是,在“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身上,这种区域文化根性是被祛魅的。无疑,现代某种程度是同质的,所以地理对于作家而言便只能是“精神地理”。有意识地激活某种地理文化内部的审美性、伦理性和风格性,并使其精神化,这是当代青年作家写作的某条可行路径。在我看来,青年作家中,比如王威廉之于西部荒凉,陈崇正之于南方幻巫,冯娜之于云南山野,事实上都构成了一种朝向精神地理学的努力。定居于贵州的李晔把自身的精神地理定位于江南,这并无不可。问题仅在于,“精神地理”必须与作家的生存体悟和文学立场构成共生关系。我隐隐感到,近年写得并不算多的李晔正在从青春的勃发中转入一种审美的沉潜,并在自觉的精神地理学构建中寻找新的出发。

■评论

一本书、两个人及他们的时代——读霍俊明《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 □商震

不是所有谢世的人都值得立传,也不是所有的传记都值得一读。陈超是中国新诗、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发展的一根重要柱石,一座伟岸的丰碑。他配得上立传,他的传记也值得一读。

近读《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两个人的形象,一个是陈超,一个是作者霍俊明。表面上看是学生霍俊明为其老师陈超立传,而深层的含义是对陈超一生的总结,对陈超所生时代及其诗歌生涯的判定。当然,不可否认,书中溢满霍俊明对陈超的挚爱。同时,我也看到,陈超对霍俊明的影响是非凡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所以,由霍俊明来撰写陈超的评传,是十分恰当的。霍俊明既是陈超的学生,也是陈超的知音。

传记的写作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历史负责。诚然,我们看到许多传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其他因素参与的传记,使得史难史,情非情,给人留下诸多疑团。但是,评传则不然。评传就是在客观事实叙述的基础上加以作者主观的情绪与态度。《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就是一本有客观事实,有主观情绪的评传。

4年前,陈超辞世,霍俊明对我说:“在我的成长期,是陈超老师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and 做学问。”一语道破,陈超对霍俊明的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我可以下结论:没有陈超,就不会有今天的霍俊明。

这本评传,霍俊明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写成,可以这样说,这3年是霍俊明最煎熬的3年。思念、回忆、收集资料、寻访等等,一边要完成评传的写作,一边要和自己的感情搏斗。感性与伦理的搏杀、缠斗、纠结可想而知。要完成这部书,必须建立理性的逻辑关系,让理性在书中生效。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霍俊明能完成这部书是理性战胜感性的结果呢?霍俊明在写完这部书后说:“书写完,我感觉把自己掏空了。”这个“空”,不妨理解为倾尽了全部的情感。

严肃地说,这部陈超的评传,实史是可靠而结实的,评价也是中肯可信的。书中的陈超与我及众人眼中的陈超是基本吻合的,当然书中所涉及的大量的细节和历史踪迹对很多人来说则是陌生的,尤其是日记和书信中的陈超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朋友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诉求。

没有哪一位作家诗人的作品是从九天云外掉下来的,任何一篇文章或一首诗,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现实生活的映照。用什么样的修辞手段都无法掩藏。陈超的一生,是见证、参与并积极推动汉语新诗发展的一生。他的理论文章对新诗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理论界也是独树一帜的。众览陈超的文章,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支撑,都有的放矢。陈超的学养贯古今、通中西,不依声符合,不趋炎媚俗。因此而赢得了理论界和诗人们的尊重。我且姑妄断之:陈超的理论文章包括诗歌,是一个时代诗歌状态的有利佐证。

陈超知识渊博,为人忠厚,有夫子气,有侠义情,感情丰沛却不随遇而安。重要的是:陈超有着庄严而强大的读书人的尊严。尊严,在今天是多么地稀缺!而正是陈超对尊严的高尚理解,才使得他主动辞去人世,灵魂飞升。

一个洁身自好、希望纤尘不染的人,想让自己不受伤,在今天,大概只有像陈超那样让肉体远离人世了。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就是“江山留给后人愁”。

霍俊明在这部评传中,详尽叙写了陈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诗学观,同时,也血肉丰满地活化了陈超的形象,既有大时代背景下的陈超,也有柔情蜜意中的陈超。值得肯定的是,霍俊明在对时代背景的评判上予以了谨慎的克制,对陈超的人本精神则进行了细腻的刻画。用人来折射时代,远比用时代框住人好。或者说,霍俊明是用陈超来折射时代的变迁与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林林总总。陈超的形象在这部评传中,生

■创作谈

是什么感召一个人想要复制人的生活,或者是这“复制”的前身,即描摹自我生活,又或者更模糊地去把握一些感想的断片?答案可以归之于“欲望”,表达的欲望、书写的欲望(纯粹书写本身)。我们会看到,在思维还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图谱时,写作才是容易的,这里有着浑水摸鱼的快意,凭借语言的自然流淌和画面的召之即来,我们便可以复刻世界的瞬间,直到划下最后一个标点,我们才可以说那些被写下的文字承载或勾连起了一个微小的世界,就像偶然走入的一扇门,门内的场景向我们展示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在门没有再度被打开前,我们无法离场,且不能断定故事的完结。

这自然是一种“追述”。事实上是否准确,谁也不说。对于写作这一封闭的精神思维过程,旁观者恰恰不具备言说的能力,而自我的招供也有着极其模糊的地带或歪曲的倾向。这是试图使一个小世界和一段生动“历史”徐徐展现的过程(要我说还有一点“开天辟地”的意味,将将能捕捉,又无法全然知晓),而此前所有的阅读在这里溢了出来,统统被重新熔铸,能感觉临界点的出现,能开始探究到一种不同味道的弥漫,隐约而又如此值得回味,似有若无的感觉背后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纵深在吸引你。那种质感绝非普通读物带来的一闪即逝甚至轻微的恶心,那是带着划痕的箭头标识出的一条虚空之路,大脑被搅动起来,文学引力初现。

清晰化是一条必经之路。这是凝聚的时刻也是让万物显形的方式,与日常发生勾连。但清晰化带来的风险如同对日常生活的表达,减一分则显枯燥(枯燥带来的是干涩),多一分则显冗余(这冗余近似脂肪的存在,超过量度,就是臃肿和赘),这之间的微妙成为衡量叙述能力的标准,而作品的主题如果摇摆不定或隐约难见更易被叙述左右,流向浅薄或晦涩。那么,越过清晰之后又是什么,也许是广阔的本质——没有焦点,也许是思想的定焦。而所有的努力,毫无疑问,最终指向的是——动人。

有一阵我迷上了摄影,我发现好的照片如同一个微妙的短篇小说,那定格时刻带来的震撼完全被包裹在未知而又能充分感知的状态之下,而其他手段已很难让人对这世界保持陌生感(那些包含时空的讲述正是祛除陌生化的过程,她是召唤而非拒绝),只有凝固的照片可以,她掐头去尾,呈现一段街区或一个路人的忧郁剪影,所有的故事都被置于照片的背面,即空白。当一处事物就这样毫无遮掩地来到你的面前,你看到的恰恰是遮掩本身。她还会产生无可置疑的疑虑:我真的认识这世界,理解另一种生活?什么都不听,没有台词,没有对白,唯有观看,这是对耐心的恢复体验,她给了观者另一双眼睛。

我每次看森山大道的《野犬》都有说不出的感觉,难以长久地看下去,甚至会有些回避,就好像那环境你也置身其中,那是完全的无依,犬的眼神保持警惕的同时射出的更多是迷茫与不经意,仿佛让你明白,我在这里,我还要走的,而不附带任何其他情绪,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会一再看见你自己。正是这个让人难以直视,也正是自我的映射让一张照片长久地保留在心里(小说亦同)。而深溯昌久的鸢又如何?《鸢》是我最喜欢的本摄影集,很多个夜晚我反复地观看,看在极暗的背景里那些黑鸟的形态,周身升起一种凛冽的感觉,鸢的身姿压倒了一切美好的事物,这里面有沉郁至极的氛围。暗夜里睁眼的鸟群隐藏着希区柯克《群鸟》式的爆发?雪地里葡萄的鸢是休憩还是死亡?神社鸟居上的那一对是在幽冥地眺望时间消逝?每一张的内容都有着强烈的魅惑性。摄影师招认说,“我自身已是其中一只”。这是真诚的。如同科萨塔援引的奥拉西奥·基罗加的那段话,“叙述故事时,仿佛仅仅对你的入物的小小的环境感兴趣,并且你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人物。小说的活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

■第一感受

“念头”的发生

——读那多《十九年间谍杀小叙》 □李伟长

从一个念头,到进化成一部小说,需要多长时间?小说家那多的《十九年间谍杀小叙》用了6年。

一位优秀的小说家,通常具备一个很重要的本领,就是可以将一个念头在心里面存放10年、20年,甚至30年,这个念头不仅能够放得住,不会腐烂,还可以在多年的等待后,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大树。

文学史上有两件事情可以佐证这个说法。一是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酝酿过程。哥伦比亚作家、新闻记者门多萨问他,你这部小说准备了多久?马尔克斯回答说:30年。门多萨颇为诧异,为什么那么久?马尔克斯说,这个素材在我心里面放了30年,一直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直到后来想通了。

还有就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匿名》。张新颖的《斜行线》一书中,有一篇和王安忆的对话。王安忆提到,这部小说起源于她上世纪80年代听来的真事,有一位大学教授外出旅游突然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王安忆就想,这人到底去哪儿了呢?有没有可能是自己从原有的日常生活里跑出去了?很多年后,王安忆去浙江探访她母亲茹志鹃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在茹志鹃的笔记里,当年这里曾经非常繁荣,这一去发现村子不在了。作者就有了一丝念头,如果那位消失的教授到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这事在她脑子里面不断盘旋,成了创作《匿名》的缘起。

马尔克斯曾说,好的念头永远不用担心被丢弃。这个在那多心里盘桓了6年的“好念头”,就是一个人会在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下用一种极端的办法审判、杀死另一个人?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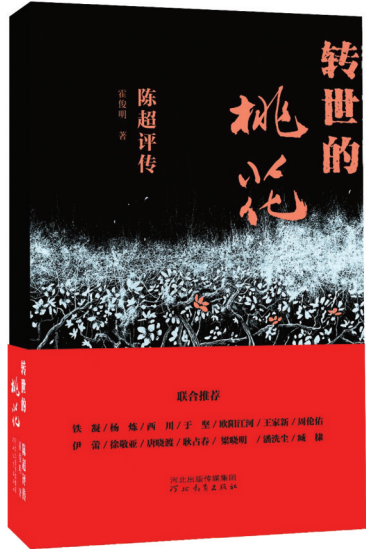
审判又会带来何种蝴蝶效应?这正是《十九年间谍杀小叙》带给我的思考,什么样的外在因素,让一个人成为现在的“我”?一个人在成长中发生意外,又会滋生出何种变化?这正是这部小说有意思的社会性。

当我们成长并且开始慢慢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生活得和普通人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过去可以被忽略,特别是那些幽暗的阴影。小说家得有勇气直面这种阴影,以及自己内心幽暗的一面。他需要面对那些匪夷所思的案件,并把这些残酷的案件在情感上洗涤干净,让读者可以接受它的发生,而不是止于让读者震惊和好奇。

在《十九年间谍杀小叙》中,你会发现不断叠加的残酷和罪恶,但所有一切犯罪动机都可以被解释。小说家细致地把人性中残酷的一面清洗干净,再把这些幽暗的匪夷所思的案件或者说某一类生活阅历,深情地讲述给读者。这种叙述可以说是岁月沉淀送给小说家的一份厚礼,其中就包括个人犯罪和集体同谋的合作。

那多的成长,正在于捕捉到了集体同谋的意识。认知这部小说,必须面对群体心理意识这个存在。就像一群孩子在一起,如果有一人挑头说,我们一起做一件坏事吧,不参与的就离开,大多数孩子可能一起参与。当一个小团体准备作恶的时候,即使你内心不愿意参与,但为了不与集体脱节,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沉默,以沉默的方式介入进去。

好的小说一开始就可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说清楚是怎么发生的。作为优秀的小说家,他的才能是把这个过程叙述得真实,它就是这样发生的。



动、鲜活、呼之欲出。

一个故去的人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活着的人才能把故去的人写活。显然,陈超是活在霍俊明心里的人。

这部评传最大的长处,是写陈超而带出时代变迁的过程,写陈超而融进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不是因为感情浓郁,而导致满纸的期期艾艾,或义愤填膺。在这一点上,霍俊明表现出一个评论家的优秀品质。

这部书面世了,想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今天的诗歌演变历程的人,应该读读这部书;想了解一个完整的陈超,必读读这部书。

最后,我要向霍俊明致敬。当人们把所有的崇高和应该仰望的人、事、物,都破坏殆尽的今天,当忠诚、良知、感情、义气几近消失的今天,当世道人心将被遗忘的今天,霍俊明能恪守做人之本,书生之义,师徒之情,尊师如父,真是可歌可赞。